

宏观经济政策与经 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 发展趋势和政策取向

王梦奎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的变化，表现出许多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可以作出以下五点基本判断。

1. 经济体制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初步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综合评价已经超过 50%。就是说，中国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2.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已经由封闭半封闭型的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有三个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由有限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面的开放，由根据短期需要实行开放转变为根据长远发展目标和国际惯例实行开放，由对部分国家开放转变为对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开放。对外贸易额 2000 年居世界第九位，中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3. 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快，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根据是：第一，伴随工业化进程，三次产业构成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变动趋势。1978~2000 年，在农业迅速发展，农产品供给实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28.1% 下降为 15.9%，第二产业由 48% 上升到

50.9%，第三产业由 23.7% 上升为 33.2%，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第二，在人口总量增加 3 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比重由 70.5% 下降到 50% 以下，二、三产业就业上升到 50% 以上。第三，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生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逐步增强。第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从 1980 年到 2000 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 50.3% 下降到 10.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 49.7% 提高到 89.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无到有，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15% 以上。从中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工业化划分标准，换算为 1998 年汇率，工业化初期为人均 GDP1200 ~ 2400 美元，若按此，中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工业化初期为人均 3010 ~ 5350 美元，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是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有十多亿人口，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体制背景，是进行国际比较必须注意的，有许多指标会发生扭曲，有许多方面有不可比性。

4.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81 ~ 2000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9% 以上，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 年 GDP 相当于 1980 年的 6 倍以上，在人口增加 3 亿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 GDP 翻两番的目标，超过了改革初期确定的 20 年 GDP 翻两番的目标。长期存在的市场商品供应短缺的状况已经结束。市场供求格局的这种变化，是一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表明经济增长已经由供给约束为主的阶段，转变为需求约束为主的阶段。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体制转换的结果。

5. 人民生活实现了两步历史性跨越，即从贫困到温饱，又从温饱到小康。现在是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说“总体上”，是因为还有 3000 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更大数量的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没有达到小康。说“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是考虑了全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不论农村还是城市，都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众生活有困难，需要给予特别关注。

以上五个方面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按照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完成了头两步，开始走第三步。这些阶段性变化，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发展进程中具体的阶段。现在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能因为 20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绩而动摇了这一点。“三步走”走了头两步，并不是走完了现代化全程的三分之二。大约还要经过 50 年左右时间的努力，到 21 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足够的认识。

观察中国经济，要注意到两个问题。

一是“总量”和“人均”。2000 年 GDP 达到 89004 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 10000 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是，中国有 12 亿以上人口，“分母”太大，人均不到 1000 美元，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现行的汇率法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是被低估的。如果按购买力平价（国际共同价格）计算，有一种测算，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和美元的比价是 2.5:1，中国的经济总量是 3.5 万亿美元，人均 3000 美元。即使这样，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排在印度和日本之前。但是，购买力平价和汇率法一样，也是有缺点的。现在国际通行的还是汇率法。不论按哪种办法，在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时，总量和人均两个指标都是重要的。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说明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人均少，

说明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

一是 GDP 和实际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GDP 总量和人均都是重要的，但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根据联合国最近公布的《2001 年人文发展》报告，中国人文指数达到 0.71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居世界第 87 位。人文发展指数是由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三方面指标构成的，0.8 以上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共 48 个；0.5~0.799 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共 78 个；0.5 以下为低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共 36 个。中、低发展水平均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按这个标准，中国是中等偏上发展水平国家。中国实际社会发展水平高于按人均 GDP 表示的程度，主要应该从社会制度方面来说明。在某些场合，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如北欧与南欧，北方与南方，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对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

从 2001 年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开始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发展阶段。一个总的判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我们考察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怎么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一，没有达到小康水平的，要达到小康水平，当然包括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首先要解决温饱，并且实现小康，就是说，去掉“总体上”这几个字；第二，小康是个比较长的发展阶段，现在只是初步实现小康，刚刚进入小康社会的门槛，还是低水平的，要向更加宽裕和安康的小康社会前进，这是提高水平的问题；第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总体的奋斗目标，不仅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包括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有多长？是 10 年、20 年，还是 50 年？可能在前 20 年需要突出强调

建设小康社会，以后侧重点逐步转到强调现代化。这是一个发展过程。

今后 5~10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 7% 左右，到 2010 年，GDP 比 2000 年翻一番。现在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美国、欧洲、日本同时下滑，这是过去多年所没有过的，对中国经济有比较大的影响，2001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去年下降，但经过努力，仍有可能达到或者接近 7%。

今后 5~10 年，中国经济发展大的趋势和政策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结构调整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就是说，经济发展要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来进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中国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水平，而不仅是经济总量的扩张。

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一个根本问题。人口多，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产业结构调整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发展新兴产业和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一是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从发展速度看，新兴产业会超过传统产业；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在今后比较长的时期，传统产业仍将占主要地位，绝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交织在一起进行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传统产业绝不意味着一定是技术落后的产业，用先进技术改造，可以提高技术含量，注入新的活力，既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可以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像服装和机械产品。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关系上，要注重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但绝不能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多，劳动力便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所在，也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技术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并不一定是技术越先进越好，在许多场合，要兼顾就业，选择先进适用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有比较高的技术含量，成为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绝不意味着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

第二，加快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为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现在遇到新的问题，农村经济又处在重要关头。首先是，农产品供求总量已经大体平衡，有的已经过剩。不少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提价没有余地，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提高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九五”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降，1998年和1999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续两年绝对减少，有9个省的农民纯收入绝对减少，其中东北三省农民纯收入连续两年绝对减少。中国农业单产并不低，种粮不赚钱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达不到规模经营，单纯务农很难使农民富裕起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90年代由4倍扩大到5.3倍。有专家研究，中国自康乾以来，土地产出率不断提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什么提高。由于人均耕地减少，加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农民一年实际劳动时间并不长，一些地方是“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赌钱”。

过去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时的情况。现在情况变化了，应该说两句话：一句话是，手中无粮，心中必慌。这说的是粮食问题的重要性，粮食安全问题不能忽视。一句话是，手中有粮，未必不慌。因为现在已经不仅是吃饭问题，还必须解决农民增收和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乡镇企业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越

来越大，但许多乡镇企业面临生产过剩和销售困难，增长速度趋缓，初始阶段那种低水平的规模扩张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讲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乡镇企业。如果更深入地考虑问题，还应该看到，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单位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乡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在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和进入乡镇企业的机会相对减少。过去那种以工代赈的办法在许多地方已经很难实行，因为用机器比用人工便宜。从社会发展看，这是一种进步，但对于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中国农村是个严重问题。当前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农民负担重，三令五申减不下来，原因是养人和办事超过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负担能力，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需要作比较大的调整。现在县、乡基层政权和村级组织，普遍存在财政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基层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全国有 50% 以上的县不能正常发放工资；乡、村两级净负债 3600 多亿元，平均每个乡负债 400 万元，每个村负债 20 万元，正常运转已经困难。县、乡以下财政开支 60% ~ 70% 是中小学教育经费。农村消费水平低，市场潜力大，只有几亿农民增加收入和减轻负担，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发展。在这方面需要采取一些大的政策。

现在讲“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发展是不错的。从长远来说，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工业化和城市化，或者也可以说，是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关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这样说：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不在城市，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点在城市，最终落脚点却是在农村。现在讲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实际上，中国需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还要加上“二元经济”结构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变。这是社会转型，其实质是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是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工业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单位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相对减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长期供应紧张。长期实行的对应之策，是严格的统购统销和城乡分割。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是必然结果。1957~1978年，21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2.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6%（1978年是18%，统计口径有不可比因素），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也低于和中国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2000年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9%，而劳动就业仍占50%。现在吃饭问题解决了，城市化进入加快发展时期，要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城市化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将会最终打破农村经济的闭塞状态，引起亿万农民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生产和生活社会化程度将会明显提高，引起市场的扩大。这也就是农村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要坚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推进城市化有认识问题，也有政策管理问题和发展规划问题。认识问题，主要是怕影响社会稳定，怕妨碍城市管理。政策和管理，主要是户籍制度改革、城镇教育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对进城农民的教育和管理问题。发展规划，主要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统筹规划，以及城市内部发展规划的问题。中国是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人口和幅员差别很大，推进城市化要因地制宜，讲究效益，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都拥到大城市不行，光靠发展小城镇也不行，规模小，不经济，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据统计，1979~1984年6年间，乡镇企业累计占地8000万亩，共吸纳5000万人就业，人均占1.45亩，高于全国人

均耕地面积。小城镇和集镇人均用地 450 ~ 550 平方米。公安部在 382 个城镇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两年共办 54.4 万入住户口，平均每镇 1424 人。发展小城镇很重要，但光靠小城镇不行。我主张提城市化。城市化可以包括小城镇，而城镇化概括不了大中城市。有些地广人稀的牧区，也有不适宜发展小城镇的。根据调查，流动农民在东、中、西部的分布是 6:3:1；在大中城市、小城镇（包括县城）和农村（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分布，是 4:4:2 城乡分割是我们的历史包袱，解决得好可以成为发展契机。农村改革是这样，城市化也是这样。人口流动可以解释过去 20 年 9% 以上的增长率的 16%，即 1.5 个百分点。有研究报告认为，如果积极推进城市化，今后 20 年，劳动力转移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 2 个百分点，成为下一个阶段增长的一个强大动力。

第三，西部开发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自中国工业化启程以来，地区发展差距从总体上即呈扩大之势。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地区政策几经变化：开始强调均衡发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重视沿海地区，60 年代至 70 年代搞工厂内迁和“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各个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纵向比较发展速度都很快，但横向比较，地区发展差距是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根据预测，今后一个时期，至少 10 年，地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即人均 GDP 的差距，仍是继续扩大的趋势；相距差距的变化趋势则取决于发展速度的差异。这是总的趋势。个别地区由于发展速度快，缩小同先进地区的差距甚至后来居上，是有可能的。

除了各省、区之间的差距外，不论东部还是西部，省、区内

部各市、县之间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这是全国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省、区制定发展战略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西部开发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事。西部地区，西南五省、市、区加上西北五省、区，如果再加上比照执行西部政策的广西和内蒙古，面积占全国的 71.3%，人口占全国的 28.5%，GDP 占 17.8%。西部地区不实现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绝不是放松或者延缓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发展，过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是从财力、物力和技术上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持西部开发和加快中西部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要把全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的关系。东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世界范围，特别是亚洲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实现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增加了经济活力，但也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的转移。这是西部开发遇到的困难。

关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这么说：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困难之点，不在东部，而是在西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点在东部地区，而落脚点最终可能是在西部地区。现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可以用更大的力量支持西部开发，支持落后地区发展，但是，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落后，取得同样的成绩需要付出比东部地区更艰苦的努力，至少要半个世纪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才能实现现代化。因此，开发西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突击性的政治任务。在整个 21 世纪，都应该注重西部的开发问题。由此可以作出结论：西部开发必须是分阶段有步骤

地进行的。有些地方现在还没有达到第二步战略目标，甚至连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此作为起点，就是说，要先解决温饱问题，再初步实现小康，在此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职责。首先是制定发展规划，例如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像交通运输网；大的生产力布局，像西电东送，都需要政府统筹规划。也需要中央政府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和政策支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国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大的动作有三次：20世纪50年代“156项”重点建设中有若干项摆在西部，60年代“三线建设”，以及近年来提出的西部开发。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和前两次不同，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制不同，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不同。重点要放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改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市场为基础促进东部地区和境外的生产要素向西部流动。

第四，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性大课题。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要把可持续发展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主要是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

要考虑两方面情况：一是，中国是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包括耕地、森林、水和矿产资源，绝大多数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水平。加上几十年来在技术水平比较低、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快速推进工业化，消耗了大量资源，粗放式的发展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二是，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环境保护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时代过去了。

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问题。1954年10月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是6亿，1969年9月是8亿，到1974年增加到9亿，只经过4年零9个月。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

率降到 10‰ 以下，2000 年 11 月底大陆人口 12.6 亿，2010 年全国人口可以控制在 14 亿。预测在 2035 年左右人口高峰期，峰值能够控制在 16 亿之内。人口增势明显趋缓，最紧张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过去了。但今后 30 年人口总数还会增长 3 亿，仍然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人口问题过去是两句话：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现在应该加一句话：注意老龄化问题。中国现在 60 岁以上人口占 10%，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社会，遇到发达国家在人口基数小、经过长期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老龄化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健全，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环境保护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还要树立一种新观念，就是把环境产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环境保护可以推动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形成新的产业。中国的环境状况，在工业污染的治理方面有改善，在治理荒漠化方面进展不大。环境保护要正确处理“内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关系问题，生态建设要正确处理“外部经济”和“内部不经济”的问题，使之能够持续进行。我们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所遇到的困难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

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是长远大计。主要是水资源和能源问题。水资源短缺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特别是北方，黄河、淮河、海河流域人口占全国 40%，耕地面积占 50%，工业产值占 31%，水资源只占 10%，必须全面推行节约用水制度。能源主要是石油问题。国内石油开发不能适应需要，“十五”时期或更长一段时间，石油年产量只能维持 1.6 亿吨或略有增长，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2000 年进口 7000 多万吨，很快就会达到 1 亿吨。有一种预计，2010 年石油的对外依赖程度将达到 50% 左右，2020 年前后年进口量可能达到 3 亿吨，超

过日本（目前年进口量为 2.5 亿吨），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而 1999 年全世界产量是 33 亿吨。要在国际上寻找稳定的石油资源供应，把这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这是关系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同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建立国内石油储备体系也是一个战略问题，要像过去抓食粮那样抓石油。由于中国资源相对短缺，在进出口贸易中，要减少初级产品出口以节约资源，进口高能耗的产品以节约能源。

第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现在只是“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说，有了一个雏形，一个大的框架，不健全、不完善之处还很多，现在经济发展还遇到大量的体制障碍。经过 20 年来的改革，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有些解决了，有些还没有完全解决，新体制也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在 20 多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必须充分考虑体制的变化，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仍然要高举改革的旗帜，强调体制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加强规范化的制度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加入 WTO，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是建立与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人们经常说两个文明建设，这是对的，但不完全。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包括三个文明建设：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外，还有体制文明或称制度文明建设。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就是体制文明或制度文明建设。

第六，发展开放型经济。

国际经济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世界经济发展三种趋势：国家经济振兴，经济区域集团化，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振

兴是加入全球化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不能只讲全球化。经济区域集团化是和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或者说，是经济全球化重要表现形式或者全球化阶梯。欧元是一个典型例子，是没有政府的货币，欧元区各国则将成为没有货币的政府。这是欧洲经济区域集团化长期发展的结果，也说明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当人们叫喊减少干预的时候，跨国公司却越来越像政府那样行事，也会危及经济落后国家的主权。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穷国和富国差距的扩大。这是许多国际矛盾和斗争的根源。中国将进一步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入 WTO 是一个重要的步骤。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并不是今天开始的，而是和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产生的。但在 20 世纪末，由于新技术革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全球化进程空前加快，规模空前扩张，是过去不能比拟的。经济全球化交织着各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竞争，必然经过许多曲折和反复，绝不会一帆风顺。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就是证明。发达国家也不是无条件主张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就是证明。全球化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对外开放就是加入全球化进程。加入 WTO 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在同经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中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必须全面估量加入 WTO 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首先是对政府的冲击，有许多管理体制和办法非改革不可。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情况。总体上利大于弊，但利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要具体分析。加入 WTO 给中国经济带来机遇，这是带有很大挑战性的机遇；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包含着发展机遇的挑战。加入 WTO 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正如舞台不足以保证演员演出成功一样。加入 WTO 只是取得入场参赛的资格，胜负取决于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增多。中国进一步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内经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大，要经常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第七，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适当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对于政府来说是个新的课题。近年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保持经济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是赤字财政政策。过去三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3600 亿元，安排国债项目 6620 个，加上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资金配合，总投资规模 24000 亿元，建设了一大批水利、交通、粮食储备和生态环境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在 1.5 ~ 2 个百分点。2000 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为 2.9%，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为 14.6%，都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之下。2001、2002 两年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没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现在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经济有很大负面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有重要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不是长期政策，需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进行适时的调整。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使用方向和效益，一是时限和力度。

第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要兼顾国计和民生，适当向民生倾斜，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生活。在社会政策上，要注重调节社会分配和解决就业问题。中国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今后几年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长比较多而劳动力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加入 WTO 之后失业的压力更大，要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撤销“再就业”中心，下岗与失业并轨，将使城镇失业问题显形化。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目前城镇的真实失业率

在 10%左右。未来一段时期，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加入 WTO，失业率有达到 15%的危险。这里还没有包括农村 1 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要把积极扩大就业作为增加收入和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基本政策。中国市场商品短缺的状况已经结束，现在是供过于求，没有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不可能开拓，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增长。

以上八个方面，是中国在今后 5~10 年或者更长时间，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政策取向。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差距和不同阶层居民收入的差距，近期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由于人口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失业有可能继续增加，弄得不好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加入 WTO 之后，不少企业会因竞争力不强而带来很大困难。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和石油危机，会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深化改革、推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三者的关系，需要谨慎地处理。国际经验证明，人均 1000 美元左右，正处于经济结构大调整和经济关系大变动时期，处于从传统的“二元经济”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发生社会震荡，要特别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但是，从长远战略眼光看，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是“成长中的烦恼”。中国经济发展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有着光明的前景。

第一，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又遇到新的技术革命高潮，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人民生活刚从温饱进入小康，正是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会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场需求潜力很大。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第二，从物质条件看。现在已经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